

【论 文】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探微¹

——基于超越、回视与改造三个维度的分析

张三南²

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革命运动和追求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必然要面对民族国家这种伴随其一生的重要社会政治现象和国家形态，也必然要涉及如何看待民族国家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遗憾的是学界对此研究存在一些不尽之处，甚或回避和片面认识。超越、回视和改造是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三个维度，三者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超越民族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回视民族国家是不应被忽视的另一思想体现，改造民族国家则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流露。超越是第一位的，回视与改造是对超越的必要补充，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重要性的重视和应对策略考量。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超越；回视；改造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经验中的通例”^{[1] (P.293)}。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革命运动和追求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必然要面对民族国家这种伴随其一生的重要社会政治现象和国家形态，也必然要思考和应对人类解放远大理想与民族国家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呢？或者说，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国家思想呢？对此问题，学界已有一些有见地的研究成果^①，但总体而言仍存在一些不尽之处。其中两个较明显的体现是：第一，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的论述，除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外，其他文本的引介和分析偏少，客观上淡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在民族国家研究领域的重要性；第二，还有的人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国际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根本立场，过于强调这种立场与民族国家现实的对立性，无形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产生了片面和固化的认识，也影响到对其诠释力的全面认知。

顾名思义，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是两位革命导师思考和应对人类历史进程中各种民族国家现象的思想统称。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历史穿透力，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思想和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涵盖了从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萌芽到未来民族国家消亡、人类最终解放的整个过程。因此，应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进行全面而非片面的理解，既要重视提炼其核心思想和基本观点，又要全面关切其关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论策。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超越、回视和改造三个维度探微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丰富内容，挖掘其辩证意涵与当代启示意义，为充实相关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一、超越民族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观点回溯与探因

¹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1-9页。

²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



超越民族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并非简单的政治立场宣示，而是体现人类解放思想的引领及警惕民族主义消极影响等深层因素。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理路进行全面回溯和原因分析，可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一基本观点的意涵。

（一）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现与思想理路回溯

1875年春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影响下制定的《德国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草案第5条，即“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2] (P.438)}，指出《哥达纲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的主张是“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2] (P.438)}。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超越民族国家最为明确的话语体现。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草案第5条的批判是严肃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宣示，这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复杂背景下尤显重要。19世纪70年代初，欧洲形势巨变，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迟到的民族国家”的统一，标志着西欧民族国家政治版图的基本形成。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第一国际历史使命的基本结束，国际工人运动进入“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3] (P.51)}。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召开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合并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哥达纲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政党建设的重要事件。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 (P.41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哥达纲领》的纲领问题。毕竟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坚持国际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原则性问题。

然而，在拉萨尔主义影响下制定的《哥达纲领》未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马克思直言“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2] (P.439)}。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对《哥达纲领》中“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的批判，并不是批判“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形式意义，而是批判“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所蕴含的“放弃国际主义”的实质意义。显然，马克思对国际主义（即工人阶级应承担的国际职责）的强调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实质的批判，体现的正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即对德国这类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超越。

马克思这一观点与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经典名言“工人没有祖国”一脉相承。《共产党宣言》虽未明确提及民族国家一词，但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民族国家的特征描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4] (P.36)}。这里所说的拥有统一的政府、法律等等“统一的民族”，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各国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此情况下，“祖国”早已不属于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国际联盟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因此，“工人没有祖国”，就是要反抗压迫、打破资产阶级国际联盟，就必须超越民族国家，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连续的思考过程，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论著中有诸多体现。

1843年春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被以色列当代著名政治学家什洛莫·阿维纳日（Shlomo Avineri）称作为马克思“最系统的论述政治理论的著作”^{[5] (P.41)}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社会观进行了批判与反思。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不同的是，他把二者关系纠正过来了，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这不仅意味着马克思1841年



以来因“林木盗窃法”引发的“《莱茵报》时期的苦恼”得到了解脱，还通过认识到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一样“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4] (P.591)}，颠覆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至上”观。马克思这种颠覆性认识虽未明确提及民族国家，但无疑奠定了从“物质的生活关系”理解各种国家形态的思想基础。

1843年底，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曲解为宗教神学问题的错误认识并指出：即使犹太人实现了政治解放（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拥有自己的“政治国家”），犹太人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换言之，作为“商人的民族”和“财迷的民族”，仅拥有自己的“政治国家”还不够，就其终极意义来说，犹太人解放的根本出路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Judentum）^②中解放出来，在于人类解放。这其中蕴含了超越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理路。

1845年3月，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批判了李斯特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经济民族主义。与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交相呼应的李斯特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德意志对内消除关税壁垒，对外实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本质上是基于德意志建立民族国家的设想。马克思对这种设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工人的民族性”不是德、英、法等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6] (P.256)}。这种批判同样体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一定意义上促成《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经典名言的提出。

（二）马克思恩格斯超越民族国家思想的提出原因

追求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母体^[7]。从根本上说，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基石。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尤其重视彰显国际主义的根本立场，警惕工人阶级囿于“狭隘的民族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类解放。正如匈牙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卢卡奇（Szegedi Lukács Gyrgy Bernát）所言，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一门“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8] (P.78)}，其根本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社会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人类解放占据着核心地位，起着引领作用，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从“林木盗窃法”这么一个看似简单却关系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现实社会普遍存在且尚待探究的深层因素。为此，他试图从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结果发现，答案不在国家本身，而在市民社会。于是他把视线转向市民社会，后又发现理解市民社会的钥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是后来马克思尤其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正是在人类解放的思想引领下，马克思充分体现了改变世界的问题意识，取得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这也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超越民族国家思想的切入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肇始于对国家与社会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存在，社会便存在；国家源于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过客，最终要回归社会；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凌驾和控制着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榨取剩余价值，掌握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最终形成资产阶级国际联盟；克服“工人没有祖国”和市民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于人类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9] (P.502)}。他们同样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 (P.591)}。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区别就是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市民社会产生了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政治解放对工人阶级而言并无实质意义，他们所处的“政治国家”恰恰是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资产阶级以“民族”名义建立的民族国家同样如此，成为掩盖资产阶级国际



联盟剥削各国无产者的幌子。早在克罗茨纳赫和巴黎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确立了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与恩格斯一道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路径。而超越民族国家，正是人类解放的应有之义。

在人类解放的思想引领下，马克思恩格斯十分警惕民族主义这个“最强有力的对手”^[10]。民族主义是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和运动之一。它既是资产阶级用于笼络人心的思想工具，也因其固有的、如美国民族主义研究“开山双祖”之一汉斯·科恩（Hans Khon）所说的“对民族国家的高度的忠诚”^{[11]（P.10-11）}这一意涵，而在事实上拥有众多拥趸，无形中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学说时遇到的“最强有力的对手”。

“人类沿着横向线划分为阶级，又沿着纵向线划分为民族。”^{[12]（P.30）}对人类群体而言，不同的自我划分方式会产生互竞的认知镜像和归属意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人类解放的路径在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13]（P.1）}的民族主义同样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众多支持者。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学说，与民族主义及其忠诚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本质上是冲突的。

更关键的是，在对民众的号召力方面，民族主义甚至具有先天优势。民族主义发端于朴实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往往是一种自发行为。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学说所倚仗的阶级认同，往往是一种自觉行为，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觉悟或革命教育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他们为何对民族主义高度警惕和持批判态度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如此，在数十年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告诫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摆脱民族主义的狭隘认识。正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直到国际工人运动以各民族国家为基地并向广度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仍然旗帜鲜明地指出《哥达纲领》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是“以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斗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以各民族的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来代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14]（P.395）}。他们这种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和警惕民族主义的革命用心，可见一斑。

二、回视民族国家：不应被忽视的另一思想体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中，超越民族国家是基本观点，体现了人类解放思想引领下对民族国家的终极思考和立场宣示，然而超越民族国家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全部。在领导革命运动和追求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忽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相反他们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回视。这里所说的“回视”，兼有“回顾”和“重视”之意，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重要性的承认和重视。这是超越民族国家之外的另一思想体现，明晰这一点尤为重要。

（一）马克思恩格斯回视民族国家的体现

与超越民族国家的“显性”思想相比，马克思恩格斯回视民族国家的思想较为“隐性”，因此往往被学界所忽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有诸多回视民族国家的体现，他们对国别史和民族国家研究的看重就是其中之一。据马克思生平和著作史可知，直到逝世前数月的1882年底，他仍在研究世界通史并编撰了《编年大事记》，扼要评述了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欧洲历史事件，其中对封建制度的瓦解和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问题尤为关注^{[15]（P.690）}。

恩格斯对民族国家问题同样很关注，晚年尤其如此。马克思逝世后的翌年（1884年），恩格斯在承担整理出版“亡友”《资本论》遗稿的繁重任务之余，先后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这两部堪称“姊妹篇”的经典论著。此二著和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1873-1874）、《反杜林论》（1876-1878）、《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1887-1888)等论著中关于民族国家的论述一同体现了恩格斯对国家问题尤其是民族国家问题的重视。

除了理论著述中的体现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在领导革命运动的具体实践中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回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曾坚持在世界革命和“工人问题”(阶级问题)框架内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一度把解决波兰、爱尔兰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解决爱尔兰问题的杠杆必须安放在英国,“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9] (P.695)}。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逐渐认识到波兰、爱尔兰取得民族独立和获得民族国家地位的重要性。1882年2月,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特别谈到,波兰、爱尔兰是欧洲“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的两个民族,并指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16] (P.473)}。后来他又在1893年《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强调,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4] (P.26)}。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波兰、爱尔兰问题上的观点调整,实则为回视民族国家的显证,是对其思想认识和实践策略的一种增进和补正。

(二) 马克思恩格斯回视民族国家的理论意涵和策略考量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回视是应对新的革命形势和历史使命的需要,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科学理论的指导。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与实践,巴黎公社是一个重要节点。伴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和第一国际活动的基本终止,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和工人运动相对低潮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也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创作上。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的经验教训以及新的革命形势,给无产阶级提出了在坚持国际主义的同时,在各民族国家建立政党的新要求。按恩格斯的话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2] (P.92)}。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单纯回到书斋,而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承担了揭示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使命。

恩格斯在1874年指出,德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上升到显要地位,而斗争需要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4] (P.218)}。正是基于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的使命感,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修订计划基础上进行《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创作,通过对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及其特点的深入分析,为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民族国家观,正视民族国家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重要性提供了思想武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经典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坚持超越民族国家基本观点和追求人类解放远大理想的同时,并未忽视欧洲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及其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的现实影响。如果说马克思对《哥达纲领》草案第5条的批判是力图从党的纲领层面来消除“狭隘的民族观点”对工人队伍的影响,以防工人阶级囿于“现代民族国家范围”而忘却了国际主义宗旨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对民族国家的诸多回视则是他们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哥达纲领》毕竟是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涉及革命宗旨和原则问题,具有重大的立场宣示性质,所采取的是旗帜鲜明的批判方式;而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对民族国家的诸多回视,更多是服务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整体目的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认识民族国家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提供科学理论武器。实际上,超越与回视本质上是辩证统一的,落脚点都是为了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的回视丰富和彰显了唯物史观的深刻意涵,具有揭示民族国家起源的基础理论意义。



1859年,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4] (P.593)}几种社会形态,不过未作进一步细化论述,这一任务后来由恩格斯接力完成。恩格斯尤其对首尾两个阶段的社会形态,即早期的国家起源及后来的民族国家形态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诠释。1884年春夏,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古代社会》手稿基础上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丰富的史料揭开了人类社会史前史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国家起源、发展与消亡的内在机理,为再现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思想作出重要贡献。同年底,恩格斯又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对民族国家进行专题论述,丰富了民族国家这种社会-国家形态的理论诠释,彰显了它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所具有的进步性和重要性。

不仅如此,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等论著中的诠释还具有揭示民族国家起源的基础理论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民族国家意味着民族与国家深刻的共生性。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石,除此之外国家还有民族属性”^{[17] (P.17)}。除了民族国家的阶级性之外,民族国家本身还蕴含着一种内在逻辑,即民族过程和国家形态的自然结合。对此,恩格斯详细描述了“语族→民族[Nationalitäten]→民族[Nationen]→民族国家”这一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指出到中世纪末期,在语族划分基础上,“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äten]”,新的民族已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形态,“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于是“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18] (P.218-219)}。可以说,在民族国家研究领域,恩格斯对民族国家起源的揭示甚为科学细致,具有经典的基础理论意义。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波兰、爱尔兰问题上的观点调整不仅是回视民族国家的体现,也是“借助”民族国家诉求和民族主义力量的革命策略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警惕民族主义这个“最强有力的对手”,但并非绝然摒弃。正如我国学者王希恩先生所论,民族主义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既有“批判”,也有“借助和吸纳”^[19]。在波兰、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就体现了这种“借助”,这也是丰富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为何这么说呢?这要从波、爱两国的重要性说起。

早在1840年,恩格斯就敏锐意识到“欧洲进步的宿敌是英国的稳定原则和俄国的制度”^{[20] (P.279)}。事实正如此,英、俄两国屡次成为干涉革命(不时伙同普、奥等国)的欧洲宪兵。因此,毗连两国的波兰、爱尔兰相应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作用。其中,波兰正处欧洲中枢地带,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只有恢复波兰才能“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21] (P.630)}。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恩格斯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具有强烈国际主义情怀的马克思同样也不会无视这一点。至于爱尔兰,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则成为打击英国统治阶级的突破口。1869年12月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修正了之前的看法,认识到杠杆一定要放在爱尔兰,“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16] (P.327)}。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逐渐意识到波兰、爱尔兰这种追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与正面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可以“借助”这种力量并将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学说,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波兰、爱尔兰问题上的观点调整,不仅体现了他们勇于纠正先前认识不足的可贵精神,更具深层意义的是体现了对民族国家的回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中除超越之外的又一体现,不应被忽视。

三、改造民族国家: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流露



除了超越、回视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流露出改造民族国家的思想，这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以及关于巴黎公社的理论与实践曾有体现，同样不应被忽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的提出，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以及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建设实践，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思想的历史穿透力及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的改造民族国家思想流露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经典名言，一些人的理解有偏差。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墨客将其曲解为“不要祖国”“取消民族”，借机行诋毁之能事。造成偏差和曲解的原因，除了政治立场不同这一因素之外，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联系前后文来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内涵。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工人没有祖国”，还同时强调“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4] (P.5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资产阶级占有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祖国”属于资产阶级，并不属于工人阶级，因此“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若想拥有自己的祖国，则“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

进一步研读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的论述，实为改造民族国家的思想流露；当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控制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 (P.33)}。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实际上就是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改造为无产阶级自己拥有的民族国家之意。

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思想流露，是对“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9] (P.536-537)}重要性的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也概莫能外，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正因如此，他们十分关心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对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明了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改造为无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根本途径”^{[22] (P.314-315)}。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如何改造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思考并未停止。1894年3月，已至垂暮之年的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还提到，“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16] (P.671)}。信中所称“共和国”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改造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可以推测，马克思恩格斯应该思考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采用“共和国”这种民族国家形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这种思考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民族国家思想的体现。

（二）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民族国家思想的深刻意涵

马克思恩格斯从国际主义和人类解放的根本立场出发，表明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基本观点，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美好愿景的希冀。同时，他们又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并未忽视民族国家存在的广泛性和长期性，在回视民族国家的同时体现了具有深刻意涵的改造民族国家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制度在大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因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人类解放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向。学界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个历史趋向时，往往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视角出发。实际上我们还可从另一个视角，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被改造、被取代的视角来理解这个历史趋向。也就是说，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被改造、被取代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和标志就是无产阶级成为“民族的领导阶级”^③。



对此，我们可从列宁后来的阐释中进一步得到印证。他曾说道，“《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没有祖国。这是对的。但是，那里不仅仅指出这一点。那里还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些不同。如果只抓住第一个原理（工人没有祖国），而忘记了它同第二个原理（工人组织成为民族的阶级，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的联系，这将是天大的错误”^{[23] (P.446)}。从中可以看出，列宁不仅肯定了第一个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的深刻内涵，还特别强调了第二个原理即“工人组织成为民族的阶级”的重要性。其中第二个原理体现的正是改造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为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国家之意，而且作为阶段性任务的改造，即“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同国际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本身是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倡导国际主义并不矛盾，“革命思想的民族化并不排除与国际主义有某种持续的联系：事实上，正是马克思及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的同事们的著作才促进了‘国际主义’这一术语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的出现”^{[24] (P.37)}。

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民族国家思想回答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之前，人类社会将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将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组织形式。学界对此的普遍理解是人类社会将经历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将采取社会主义国家形式。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不过，倘若我们从民族国家发展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视角去进一步理解，不难发现这种社会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国家形式也是一种改造和取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后的人类发展阶段和国家形式，即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民族国家思想后来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既是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的理论胜利，也是工人阶级改造和取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初次实践。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建设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当然通常是以“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话语形式呈现。需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基于不同层次的“民族”涵义（前者基于 nation，后者基于 nationality）而言，二者并不矛盾。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应坚持的通用提法是“多民族国家”。但从政治学和国际法意义上说，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具有领土主权、国旗国歌等基本的国家要素，也可称作为“民族国家”。因此，我们应避免“将多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对立起来”的这样“一种误解”^{[25] (P.27)}。

另需说明的是，当前国际共运正处于低潮，但并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改造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思想，也契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设想，体现了深远的历史穿透力。可以说，20世纪世界范围内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体现。

四、超越、回视与改造民族国家思想的辩证关系及当代启示

不可否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学界一些人存有偏见。有的人认为，在马克思讨论的所有历史现象中，“他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的考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26] (P.368)}。还有的人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27] (P.101)}，遑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理论，这种偏见现象并非孤例。学界也曾长期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认识不够全面，直到近年才有一个较为显著的改观^④。鉴于“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二者有诸多相通之处，我们同样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及其意涵进行全面理解。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超越、回视与改造三个维度具有内在的辩证关系。超越民族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回视民族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中不应被忽视的另一体现，改造民族国家则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流露。超越是第一位的，回视与改造是对超越的必要补充，体现了对民族国家重要性的回应和应对策略考量，以及对人类解放理想与民族国家现实之间关系的辩证认识。换言之，如果说超越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和远大理想的话，回视则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重要性的承认和审慎认识，而改造则是一种契合人类解放阶段性目标和任务的体现，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建立建设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了值得挖掘的理论诠释。

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人类解放的根本立场出发，表明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基本观点，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希冀。同时他们又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并未忽视民族国家存在的广泛性和长期性，并相应对民族国家进行回视，流露出改造民族国家的思想。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于明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理解当今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辩证认识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之间的关系，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28] (P.16-17)。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印证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正是承继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思想辩证意涵的当代体现。

注释：

- ① 相关研究成果有：陈君《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国家思想》，载《学习月刊》2008 年第 11 期；任勇、付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视野中的民族和民族国家》，载《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成小明《马克思的民族国家概念辨析》，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王文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民族国家构建及其效能》，载《新疆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陈坤、李晓青《民族国家形成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对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的文本分析》，载《理论视野》2017 年第 1 期；邹诗鹏《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国家观》，载《复旦学报》2017 年第 2 期；马德普、杜孝珍《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可称为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吗——简析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国家论述的几个误解》，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6 期；等等。
- ② 马克思所说的“犹太精神”，德文原文是 *Judentum*，表面上指的是犹太人在经商牟利活动中表现出的唯利是图的思想、习气，更深层次的含义指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市民社会私有制及人的生活本身的异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50 页。
- ③ 值得注意的是，1888 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把原文中“民族的阶级”翻译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更加明确地彰显了这种意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50 页。
- ④ 2007 年，我国学者王希恩先生精辟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批判、借助和吸纳”的核心观点，推动学界加深了对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全面认识，之后陆续有成果推进这项研究。参见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载《民族研究》2007 年第 5 期；张三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载《民族研究》2007 年第 5 期；张三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载《民族研究》2007 年第 5 期。



认识：“困难对话论”评析》（上、下），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3、4期；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等等。

参考文献：

- [1]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S.A. 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刘同舫，“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再探析”，《哲学研究》2007（3）。
- [8]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陈玉屏，“关于阶级、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5）。
- [11] Hans Kho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6.
- [12] [澳]伊恩·卡明斯，《马克思恩格斯与民族运动》，柯明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 [13]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 [14] 王炳煜、王力，《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 [1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1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5）。
- [2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2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2]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3]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4] [英]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张帆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25] 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 [26]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27] [法]亨利·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 [28]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